

贵州民俗研究 70 年: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杨兰^{1, 21}

(1.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2.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自 1937 年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 贵州民俗研究随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组织的民族调查而获得长足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三次大规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为贵州民俗研究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顶层设计和西方口头传统理论及成果的规模输入也为贵州民俗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贵州民俗研究实现了从“资料取向”转向“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学术史 七十年 民俗研究 贵州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12-080-086

“黔开自明世前, 此皆溪洞苗蛮也。故今各府风俗, 止就明以来志乘中语书之。其汉、唐、宋诸史书中, 西南夷、南诏、南蛮诸传所载, 则编于苗蛮之首”^[1]。贵州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聚居地, 民俗^[1]资源丰富, 考察贵州民俗研究的学术史, 可见时空距离的缩短, 不仅强化了作为地域符号的民俗文化, 也强化了地域内文化持有人的文化权利, 学术史的梳理无疑成为学科发展和地域研究的理论参照。

一、从为黔定位到历史重构:贵州民俗研究发轫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和部分出国留学者介绍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 贵州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阵地。一方面, 黔籍学者迫切想证明地方性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回应时代诉求和国家需要;另一方面, 原生态的文化生境成为资料学研究的最大贡献, 也成为多元化文化自证或证实的重要材料。具体来讲, 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民俗研究, 除学界观照较多的吴泽霖、谢六逸等外, 大量黔籍学者的地域文化研究历百余年仍有学理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民俗研究, 沿民族大调查推进, 影响贵州民俗研究七十年。

(一)为黔定位:入黔学人与黔籍学人的民俗考察

在被视作蛮荒之地时, 西方传教士便已系统关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1640 年, 葡萄牙耶稣会士德·马盖兰斯(Magallang·Gabrieli)入华游历, 所著《中国新纪实》^[2](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1688 年)较早记载了贵州苗族语言、文化、习俗等相关资料。1876 年, G·M·H 普莱费尔(Playfair)以著作的形式^[3]记载了不少贵州苗族资料和图片, 为贵州苗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被作为一门学问开展研究, 黄遵宪、夏曾佑、蒋观云等首先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屯堡文化综合数据库建设”(17ZDA16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15CMZ017)。

作者简介:杨兰,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

对民间文学提出了各自观点，后章炳麟、鲁迅也对民间文学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4]

对贵州苗族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收集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末英国传教士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R Clarke)在黔东南的调查，^[5]至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とりいりゅうざう)在贵州安顺搜集记录了苗族创世神话和瑶族槃瓠神话。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里(Samuel pollard)在昭通布道时，因苗族信众常往返于威宁与昭通之间习知求道，遂于 1905 年春迁址石门坎建校招生，翻译苗族歌谣和研究苗族文字。^[6]随后黔籍学人安健^[1]与杨万选^[2]详尽考察贵州彝族和苗族，涉及组织模式、风俗信仰、传说故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开启了贵州本土民俗研究。

抗战爆发后，民间文学的阵地转向了西南地区，自谢六逸出任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伊始，贵州民俗研究有了兴燃之势。1938 年春，大夏大学成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调查研究西南民族社会与经济，在调查过程中，深感贵州民俗资源的丰富，将该调查室改为“社会研究部”，将调研重点转向社会状况与民俗材料的调查与研究，民间文学在此阶段亦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一批学者，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调查，调查地涉及贵州安顺、炉山等县市，后将所搜集的资料汇编成多部调查报告出版。^[3]

吴泽霖的相关研究始于此次调查，他关注并记录了贵州苗族的各类神话，^[7]如洪水神话、兄妹婚神话等，^[8]他的神话研究受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影响颇深，重点关注神话的社会功能，诸如从社会学和民族学角度讨论神话中的人类始祖、火的起源等。经过长期调查，吴泽霖开始关注贵州的民族分类问题，他通过饮食、服饰、居住、婚丧的比较探讨贵州苗夷与汉文化之不同，认为通过语言识别民族有可取之处，但又因人的语言学习能力，发现以语言区分民族之弊端。^[9]杨汉先是黔籍学人，1940 年到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1941 年到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在闻家宥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大花苗移入乌撒部考》的写作，并于 1942 年刊登在该所刊物《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10]后又与闻家宥一起发表了《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深刻揭露了彝族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没落缘于森严的等级内婚制，统治阶级间的婚配因距离的遥远、婚配范围的紧缩，导致近亲婚配产生极严重的生育问题，在统治阶级范围内，人口死亡率逐渐攀升，更有族灭的可能。^[11]岑家梧在 1940 年接替吴泽霖的工作，于 1943 年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学者一同赴黔南考察仲家(布依族)祭礼，详尽记录了荔波仲家“作桥”礼仪。^[12]陈国钧从 1941 年至 1943 年间，深入贵州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搜集工作，认为歌谣隐含了个人遭遇和喜怒哀乐之情绪，就苗夷而言，歌谣替代了文献历史，有其研究价值，遂作《贵州苗夷歌谣》，举凡有调均纳其中，又与吴泽霖合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影响颇大。^[13]至新中国成立前，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学者们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4]均是基于调查过程中所搜集的材料，进行记录整理的民间歌谣、故事和传说等，成绩蔚为可观。

自西方传教士入黔，贵州民俗作为调查重要组成，始于介绍性质的概说。至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调查，资料学意义上的搜集整理成果为后续研究筑牢了根基。作为一种亚文化，民间文学与文化长期游离在学人研究视野之外，尽管研究之始基于政治诉求，但所带来的燎原之势推动贵州民俗研究走向成熟。

(二) 重构历史:民族识别与民俗搜集的返本开新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民俗研究进入新的篇章。1950 年，陈志良在其专著^[14]中专辟章节记录了贵州苗族、瑶族、侗族、彝族习俗。1951 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赴贵州进行少数民族访问工作，专作七篇文章辑录成集，主要介绍贵州各民族历史发展、风俗习惯、人口分布以及语言使用情况等。^[15]1952 年，贵州开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采录工作，由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教授主持，成员有邵昌厚、潘昌荣和今旦等，赴黔东清水江一带进行苗语调查，并记录苗族歌师的史诗唱诵，完成《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的采录，以及祖源故事《洪水滔天》《溯河西迁》的整理。

1956 年，全国开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和湖南由吴泽霖带队任组长，仇复荣任副组长，以巫脚交(今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巫脚交村)为试点，耗时 4 个月将巫脚交的民族经济发展情况、风俗礼仪、服饰饮食等调研资料汇编成 50 多万字的调研报告。1957 年赴台江、罗甸、从江、剑河、雷山、丹寨、黄平、炉山等地分片调查，汇编完成了多部调查报告^[1]。次

年，因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需要，成立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展开调查^[2]，涉及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壮族、仡佬族等，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情况，至1963年底，调查组撤销。^[16]

同一时间，贵州省文联关注到了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组织人员到清水江流域苗族地区搜集了苗族诗歌近百首，民间故事百余个，基于此次调查所获，省文联开始着手《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的编印，共72集^[17]，涵括了贵州彝族、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民族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苗族民间故事选》也于1962年编印^[4]，众多民间文学资料的刊印成为资料学意义上的重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17]和1963年^[18]署名为华西和云峰的作者，在《中国民族》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贵州民族研究所在编写民族简志过程中所遗留的问题并进行探讨。1964年至1965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印了黔东南舟溪、罗甸、台江、剑河等地的调查报告^[3]。1966年贵州省博物馆对赫章县汉墓的挖掘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大批文物资料为贵州历史与民族的研究提供了证据支撑。

伴随三次民族大调查工作的开展，自1937年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贵州民俗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从对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情况的分类梳理转向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尽管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仍然延续了早期的搜集整理之法，但学者们认识到了歌谣、故事、史诗中的学术价值，无疑为深入研究的破题之举。

二、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信:贵州民俗研究滥觞

1967至1977年的贵州民俗研究，除涉及夜郎考古的民俗研究外，仅有资料学的积淀。1967-2005年贵州民俗研究的树状知识网络基本成型，由“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的弱势心态转向“夜郎自古不自大，黔驴从来就不技穷”的文化自信，跨学科研究渐趋常态。

(一)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夜郎文化研究

夜郎研究始于史学视域，1958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依托搜集整理的贵州史资料编写贵州古代史，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史上重要组成受到瞩目。赫章考古出土了夜郎时期文物，随即省博物馆邀请省内高校以及科研部门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在会上侯哲安教授介绍了他所搜集整理的相关文献，虽然会后未有论文发表，但确为贵州夜郎研究的首次行动。

1978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后，在贵阳召开了古夜郎问题讨论会，参会学者分别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角度对夜郎族属、疆域、社会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考古挖掘，大量文物出土，为夜郎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受限于诸多因素，研究者们深感研究之困难，能形成定论的观点不多。会后择14篇辑入《夜郎考》论文集之一。

1979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较之前增加了十余篇，吸引了许多省外专家参会交流，这次会议在上次讨论的基础上，延伸了民俗学、文献学角度的讨论，会后辑23篇文章入《夜郎考》论文集之二。

考古仍是夜郎研究的关注点，有学者详细介绍建国以来的文物考古工作，旨在为夜郎研究的学人提供研究资料，^[4]亦有学者围绕墓葬形制、埋葬礼俗、文献典籍，探讨墓葬的族属问题，并提出赫章可乐“西南夷”墓群的族属应为“百濮”系统的观点，^[19]辑录文献的考证成为夜郎研究的重要方法，如考释汉牂牁郡34城，认为夜乃谢之音转，夜郎之夜，本当作谢^[20]，又如溯源夜郎、牂牁等疆域沿革及贵州八十二市县来历等，这些成果各有理据，但资料缺失以及推理演绎中有诸多难以把握之处，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随着夜郎研究热潮的蔓延，云南、四川、上海的学者也相继加入贵州研究队伍，纷纷寄来夜郎研究相关文章，最终汇编成《夜郎考》论文集之三。翁家烈在关注夜郎史学问题的同时，注意到了研究地域内的竹王神话，从竹王神话出发，沿文献中的历史脉络，分析夜郎社会性质，^[21]至夜郎学术研讨会议后，他继续探讨夜郎族属、势力范围、社会形态等问题，认

为夜郎县在当今贵州北盘江流域的贞丰、册亨、望谟、晴隆一带，古夜郎为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建。^[22]

夜郎研究在省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从地域范围、民族归属和史学意义上的探讨延伸到民俗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通过不断深入的挖掘，亦对以往定义进行纠偏。然而，集中的交流探讨相比分散的个人研究更能推动研究发展，“99’夜郎学术研讨会”^[1]的召开成为历史必然，各地学者的参与将研究推向了高潮。鉴于夜郎学术研讨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贵州、湖南、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六地学者深感成立夜郎文化研究院的必要，在贵州民族文化学会、贵州省彝学会、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仡佬族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回族学会的大力支持下，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于2004年正式成立，自此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所挂靠的贵州民族学院成为夜郎研究的重要阵地。成立之初，收录夜郎研究90余篇论文编《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一、卷二），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设“夜郎文化研究”专栏，发表第一期中外学者夜郎文化研究成果。随着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夜郎文化研究巨著《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上、中、下）出版，是自“哎哺到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在人们共同体或政治实体存在中的‘夜郎古国’及它的史源文化的全方位记录”，^[23]夜郎文化研究院强调从彝文古籍中探索夜郎问题，成果之丰如《中国彝诗文化理论研究》《夜郎史传》等理论研究为夜郎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雄厚基础。

回溯夜郎研究众多成果，学者们虽多角度探讨，最终都回归到疆域、族属等早期问题中，研究视角仍显单一，当下夜郎文化伴随贵州旅游发展，进入旅游研究领域，成为贵州旅游的核心要素，其意义和价值正不断沿外延扩展。

（二）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民俗文化研究

1979年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成立，成立之初就如何编好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民族史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实际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在第二次研讨会中，提出了进行“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的提议，1982年贵州民族研究学会组织，贵州民族研究所牵头，联合贵州民族学院、省社科院、省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对贵州展开了全面的民族调查，调查自1983年起至2017年仍有成果面世，^[2]历时35年之久，范围广，成果多，影响深。1982年启动首次调查，由贵州民族学院教师柏果成带队考察荔波的瑶山、瑶麓和茂兰三个瑶族聚集区。次年正式成立“月亮山区域民族综合考察队”，分设瑶山公社、加宜公社、计划公社、孔明公社、瑶语、都柳江考古等6个调查组，历时2个月，分别到荔波、榕江、从江等十四个调查点对苗族和瑶族进行调查，撰调查报告31篇，计80余万字，定名《月亮山区域民族调查》。继此次调研之后，每年一次或几年一次调查从未间断，并将调查内容如期汇编印刷，形成了海量的系列资料文集。^[3]

1980年至1982年期间，研究者对贵州酒俗、戏曲、歌谣、葬礼等方面的研究也多有涉及。据考古“夜郎旁小邑”及史料佐证，有学者认为贵州本土少数民族的酿酒历史可以上推至西汉早期的夜郎时代，歌谣的研究也从早前的记录整理转向了艺术研究，“八音坐唱”被认为是布依戏的初级阶段，因贵州布依族主要分布在盘江流域一带，与广西仅一水之隔，故而认为布依戏多从壮戏演化而来。《苗族古歌》的出版，受到钟敬文先生的肯定，也得到潜明滋先生的赞赏，认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古歌，蕴藏着巨大的科学价值，^[24]其序言部分已初显民俗研究的影子。1982年彝族史诗《洪水泛滥史》提出史诗蕴含历史文化信息和先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25]的观点，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6年“贵州神话和史诗学术讨论会”在花溪召开，要求以神话和史诗为研究重点，将神话和史置于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26]与钟敬文先生在1991年提出的“民俗学文化”强调民间文学的研究要进入文化视域^[27]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贵州神话与史诗的研究，逐渐从族属追随转向文化研究。有从宗教整体形态的研究，借助神话和宗教观念、宗教活动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28]亦有就文本本身的研究，关注文本文化意义，何积全的竹王传说研究正是对会议主题的积极响应。

1987年3月贵州召开了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关注各民族民俗事项，鉴于少数民族历史多无文字记载的现实，民俗事项成为探究民族形成、文化形态、经济生活、历史变迁等问题的“活”文献，会议论文集设人生礼仪、精神信仰、岁时文艺、社会功能四章开展讨论，是贵州省第一部民俗学文集，标志着贵州民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同年，贵州召开侗戏学术讨论会，曲六乙在会上提出了要建立科学的侗戏学，这不仅是基于研究队伍的形成，更是基于对各民族侗戏情况的深入了解。1988年3月，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日本中国民俗学学会”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贵州侗文化及民俗研究的协议书”，侗戏研究迈向系统性研究阶段。特别关注地戏脸子的沈福馨就地戏源流、分布情况、脸子及艺人传承较早进行了专论研究，^[29]并相继编撰了多部介绍性书籍。1990年，庾修明出版了首部全国性的侗戏侗文化研究专著《侗戏·侗文化》，并作为顾问出版两部侗戏和侗文化研究的资料集。这一阶段，地戏研究专攻侗戏演化、剧种之争、戏剧特征等问题，产出一批研究成果。

多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促进了研究发展、实现了研究转向、拓展了研究领域。贵州民俗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学术转向，和贵州民俗资源的繁盛，吸引了大量省外研究者的目光，他们的加入充实了研究队伍，贵州民俗研究向多元化发展。

三、到民间去与朝向当下:贵州民俗研究现代转型

(一)到民间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贵州实践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并将口头传统、民俗活动、民间表演艺术、传统技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纳入相关的文化空间。自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公布至今，贵州共有104个项目(含扩展项目)入选，民族音乐、医药、技艺等进入人们视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研究蜂涌而起，极大地推动了贵州民俗学学科的建设。硕士授权点、博士建设项目等一批本土高层次培养机构的建成，培养了诸多新生力量，充实了贵州民俗研究。

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和到民间去的学术实践，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顶层设计，也带来了地域民俗研究的实践转向，贵州民俗也因此进入朝向当下的实践，非遗研究取得颇丰的成绩。从遗产保护角度生发出以静态保护为主和以产业开发为主的双方论辩，双方论辩难以胜负盖棺定论，但以现实走向来看，当前的非遗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与实用主义的驱动下，正朝着产业化发展道路迈步，个案研究也成为非遗研究的主要形式。针对非遗的保护问题，在各专家学者的研究上贵州形成了多种保护机制，一事一议的策略将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等保护机制落实到非遗保护的实践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2000年译介引入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口头传统的研究渐兴蓬勃之势，贵州学者亦有沿此向进行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人在非遗之外探索民俗文化资源，不断拓荒丰富贵州民俗体系，为贵州成为民俗研究重地而奋力耕耘。

(二)双重取向: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

实践表明，已有研究成果事实上无法绕开文本或文化，研究文本不能脱离文化，研究文化亦不能脱离文本，为避免研究成果的无限向前端延伸或无限向后端延伸，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成为重要导向。诸如拓展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对作品本体结构、类型化、人物形象、文化本质进行专门研究或比较研究，爬梳作品流变轨辙，探讨演变规律。母题研究的方法在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得到发展，以主题、母题、类型为切入点的比较研究超脱了文本范畴进入历史、文化、心理等领域。苗族口传史诗《亚鲁王》面世后，沿用母题分析的研究方法，将文本置于史诗生存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考量，厘清其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探寻史诗稳定传承的文化内核，是贵州少数民族史诗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传承人研究基于民间文学的口传性特征，传承人在文学作品、民间技艺的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载体作用，同时仪式场域的研究也随之被捆绑，作为文化的传承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既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积极回应国家力量的整合和现代文化的挑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

近年出版的系列民族文化丛书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向后端延伸梳理零散成果，以民族为划分标准，形成了苗族文化研究、彝族文化研究总集。以语言文字、民俗文化、文学艺术为主题，将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贵州少数民族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间歌谣中剥离凝练，追寻原始思维方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17 年在贵州考察调研，将新时期贵州毕节彝族、黔东南侗族、台江苗族的文化作为补充和完善，形成三部资料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民俗的变异性决定了随时间的纵向延伸，民俗形式、内涵、功能等均会产生变化，资料学意义上的调研和搜集是保持研究活力的重要基础。

(三) 朝向当下: 贵州民俗研究的学理实践

随着“文献考据和文本溯源式的研究逐渐为对当下的民间传统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民族志所取代”，^[30]现代性转向为贵州民俗研究朝向当下的学理实践开辟了新路径，生态学的研究亦随环境问题的凸显成为民俗研究的热点，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强调的生态，是指民间文学的生存土壤，当下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观念的整体性思考，亦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传统研究过多关注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角色人物，而贵州历史名人众多，亦可成为民俗研究中的新阵地。尹珍文化虽研究者甚少，却因“北有孔子，南有尹珍”的言论而不可不予言说。尹珍是东汉儒家，师从文化大家许慎和应奉，学而返乡设学，被称为贵州文化教育的拓荒人，有“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的美誉，故而有“尹珍文化为贵州文化之发端”的说法。1980 至 1999 年间的尹珍研究主要是对其身世、故地及教育影响的探讨，2004 年由正安县人民政府带头编印了《尹珍文化》一书，共辑 23 篇尹珍文化研究文章，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武当山得道，福泉山成仙”，世传张三丰在贵州福泉得道升仙，其传说故事颇丰，在贵州，张三丰传说被收录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同时也被辑入黔南州卷、遵义卷、道真仡佬族苗族卷、都匀市卷、独山县卷、瓮安县卷以及《黄平民间文学集》中。而专门整理出版的张三丰故事册子^[1]则繁不胜举。福泉市三丰文化研究会还专门创办内刊《三丰文化》旨在收录张三丰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研究文章，两期刊物所刊登的“宝塔镇犀牛”和“贵定借井”丰富了张三丰传说群，但限于经济原因刊出两期遂停刊。即便有着丰富的传说故事，贵州张三丰的研究始终不咸不淡，除刘守华教授在其《张三丰寻踪》^[32]中用 30 余页记录了张三丰在贵州的 12 则传说故事外，鲜有研究文章出现。

四、思考与展望

回顾贵州民俗研究七十年，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向：从资料搜集整理转向史学与民族学研究，从族源与地源的厘清转向文化本质的思考，从单一研究方法转向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联动。抗战爆发，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特别是大夏大学成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对贵州民俗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系列民族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学辑录资料的刊印，为贵州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贵阳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2004 年成立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标志着夜郎研究贵州的领军地位，夜郎文化的研究成为贵州民俗研究的重要阵地。2005 年贵州 3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贵州民俗研究开始转向非遗研究。2005 年以来有一批硕博学位论文亦关注贵州民间传说、故事、史诗、戏剧等。

七十年来，贵州民俗研究自不止文中所举要目，研究旨趣沿历时脉络从为黔定位到历史重构、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从到民间去到朝向当下。不考虑全知视角，仅以限制视角和他者视角考查地域文化持有人、学术共同体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见多重要素均可纳入贵州民俗的研究边界，活形态、地域性和接受性无疑成为贵州民俗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资料取向”到“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亦将成为较长时间内贵州民俗研究的基本导向。

参考文献:

-
- [1]胡朴安. 中国风俗(上)[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408.
- [2] Gabriel de Magalhães: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particularitez les plus considerable de ce grand Empire [M]. Paris. Chez Cladue Barbin, 1688.
- [3] (法)高尔迪埃, (法)维亚尔. 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M]. 校真, 译.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80.
- [4]刘锡诚. 二十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 [5]何积全. 贵州民间歌谣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271.
- [6]毕节地区政协工委. 黔西北文史资料 2[Z]. 毕节地区政协工委, 2001:323-324.
- [7]吴泽霖. 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J]. 革命日报·社会旬刊, 1938(4)(5).
- [8]吴泽霖. 苗族中的神话传说[J]. 社会研究, 1940(01).
- [9]吴泽霖. 贵州的民族[J]. 《文迅》第五卷第一期, 1944:4-68.
-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民族史料专辑[M]. 1986:174-175.
- [11]闻宥, 杨汉先. 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C]//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 1943:19-21.
- [12]岑家梧. 黔南仲家的祭礼[J]. 风物志集刊, 1944(01):104.
- [13]吴泽霖, 陈国钧等.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J]. 图书季刊, 1943(3-4):104.
- [14]陈志良. 西南风情记[M]. 上海:时代书局, 1950.
- [15]铁木尔·达瓦买提,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343.
- [16]王文光, 朱映占, 赵永忠.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下[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 [17]华西. 贵州少数民族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一)[J]. 中国民族, 1962(12):38-39.
- [18]云峰. 贵州少数民族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二)[J]. 中国民族, 1963(01):37-38.
- [19]宋世坤. 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探[J]. 贵州民族研究, 1979(01).
- [20]方国瑜. 汉牂牁郡地理考释[J]. 贵州社会科学, 1980(02):39-52.
- [21]翁家烈, 史继忠. 论夜郎的社会性质[J]. 贵阳师院学报, 1978(01):70-73.

[22]翁家烈. 夜郎县及创建古夜郎之民族考略[C]// ‘99 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夜郎研究,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158-163.

[23]王子尧. 夜郎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6.

[24]潜明兹. 奇异的神话诗——评《苗族古歌》[J]. 中国民族, 1980(02):31-33.

[25]安尚育. 贵州彝族史诗《洪水泛滥史》初探[J]. 贵州民族研究, 1982(04):185-192.

[26]万建中. 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生活: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转向[J]. 西北民族研究, 2018(04):134-141.

[27]孟慧英. 布依族的神话与宗教[J]. 贵州民族研究, 1987(04):113-121.

[28]沈福馨. 安顺地戏[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29]刘晓春.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 民俗研究, 2009(02):5-35.

[30]刘守华, 李征康. 张三丰寻踪[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4.

注释:

1 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的《民间文学论丛》中专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将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视作民俗志和民俗学的构成部分。

2 1911年, 安健在《地学杂志》二卷十八期发表《贵州土司现状》, 1928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四卷四四至四五期上发表《贵州民族概略》。

3 1929年杨万选撰《贵州苗族考》, 系贵州苗族首部系统性研究著作。

4 社会研究部的学者们先后于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 出版了“贵州苗夷研究丛刊”以及《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多种。

5 《洪水滔天歌》《太阳月亮的神话》《侗家洪水歌》《花苗开路歌》《侗家朱洪武歌》《黑苗七月会歌》《红苗情歌》《格江黑苗情歌》《黑苗情歌何家弹棉花歌》《水家酒歌》《普定水西苗婚歌》《普定水西苗送郎歌》等。

6 《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婚姻》《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苗族调查资料》《台江县巫脚交经济发展状况》《布依族的婚姻》《贵州台江县苗族的家族》等。

7 调查点包括遵义县、罗甸县、三都县、榕江县、黔西县、望谟县、安龙县、从江县、台江县、丹寨县、雷山县、剑河县、黎平县等 20 余处。

8 《贵州省黔东南舟溪地区苗族的生活习俗》《贵州省罗甸县平亭村布依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贵

州省台江县巫脚交苗族人民的饮食》《贵州省剑河县久仰乡必下寨苗族社会调查资料》等系列调查报告。

9 《夜郎考》《贵州史专题考》《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牂柯沿革考》《夜郎国族属考》《夜郎沿革考》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10 1999年11月24日在贵州贵阳召开由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夜郎学术研讨会”，影响广泛，学界称为“99’夜郎学术研讨会”。

11 2017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为了解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进入新环境后的文化适应情况，掌握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形成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17年调查专辑》。

12 文集包括《贵州民族调查》24集调查报告、《民族志资料汇编》11集、《民族研究参考资料》30余集部分资料、《贵州省志·民族志》《中国苗学》《夜郎故地上的女性》《水族通史》《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奇异的石头世界——贵州岩石载体文化》和《苗族简史》《布依族简史》《侗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5部民族简史，以及“六山六水”调查资料集共10集。

13 彭松荣整理《张三丰故事》、王巩汉著《黔南山水情》、黔南文艺研究社主编《邈邈道人张三丰传奇》、杨国霖与熊生祥搜集整理《张三丰传说故事与遗迹》、杨承德编《张三丰逸闻》、李以智与黎昌念主编《息烽民间故事选》等。